

猫的摇篮

〔美〕库尔特·冯尼格 著

陆 凡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美国文学



猫的摇篮

〔美〕库尔特·冯尼格 著
陆 凡 译

猫的摇篮

〔美〕库尔特·冯尼格

陆凡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56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

统一书号：10094·711。 定价：1.70元

猫的摇篮本来只是一截交叉缠绕在双手上的绳子，可是小孩子却对那些交叉的十字看了又看……
其实既没有该死的猫，也没有该死的摇篮。

前 言

库尔特·冯尼格1922年11月2日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是美国当代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以幽默风格著称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中经常有科学幻想内容，所以有的评论家在提到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流派时也举他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冯尼格曾被德军俘虏，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目击者。冯尼格曾就学于芝加哥大学和田纳西大学，是杂志上短篇小说撰稿人。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有：

《自动演奏的钢琴》(Player Piano, 1952)，内容描写在未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常规的脑力工作贬值了”，人自己创造比他本人工作效率更高、更持久的一种人，于是天然的人就没有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了。机器完全取代人的步骤是从第一架自动演奏的钢琴开始的。作品的主题是讽刺机器完全控制了人的社会，并提出了“世界应当归还于人”的问题。

《泰坦族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 1959)的背景也是写未来。故事内容描写人类对空间的探索，范围从地球到火星，又到水星。书中写到，在这个故事开始以前，人类已经走向空间世界了。空间世界也和地球一样，是“无穷无尽的毫无意义的梦魇”。作者的思想是：无论是地球或是别的星球上都有不公正的现实。因此人只要爱自己周围的人就行了。

《夜母亲》(Mother Night, 1961)的故事背景是现时

社会。作者提出“与其可耻地活着，不如死去”的主题。主人公霍华德·坎佩尔是一个“为恶太猖狂，为善太隐蔽，为他的时代的罪恶服务的人”。他的道德观就是人要伪装得好。坎佩尔是一个住在德国的美国间谍。他公开为纳粹做宣传广播，暗地又把情报送给同盟国。他在自白中说，他犯了“高度背叛的、反人道的罪行，违背良心的罪行”。作者的态度很明显，也是反对这种“罪行”的。他认为这样活着是可耻的。

《上帝祝福你，罗斯瓦特先生》(God Bless You, Mr. Rosewater, 1965)一书的主人公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后裔，他“统治着在美国一切值得统治的东西”。罗斯瓦特写了一封遗书给“罗斯瓦特基金会”，请该会把信转交给任何一个继承他的遗产的人。信中揭露这一大笔财产是怎样敲诈、勒索罗斯瓦特县的人民得来的。他要把一些东西还给“为罗斯瓦特家积累财富而被奴役的人们的后人”。罗斯瓦特认识一个科学幻想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他把这位科学小说家视为“伟大的预言家”。他认为只有科学小说家“才有足够的力量真正关心未来，真正注意到机器对我们做了什么，战争对我们做了什么，惊人的误解、意外的事件和灾难对我们做了什么”。这部作品揭露了资本家残酷掠夺的罪行，强调了科学小说的作用。

《第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 1969)中的主人公叫比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利所在的一个团被德军击溃了。比利藏在一个屠宰场的地下冷藏肉库中得以幸存。他在德占区到处流浪，被另一个星球特拉尔发玛多里亚上的居住者给劫持去了。特拉尔发玛多里亚人很有天赋，能立即看穿一切事情。比利在他的游历中看到了死亡的普遍性和战争

的不可避免性，看到了人类的幻想总是与制造更巧妙的杀人武器连在一起。特拉尔发玛多里亚人使比利相信，如果人象冻结在一块琥珀中的虫子一样，那么现在、将来、永远都存在，死亡就只是外表上的事情了，所以人不必为死亡而忧虑。书中再次出现那个科学幻想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基督教徒残酷、杀人的问题，攻击了基督教和福音书。这部小说以人道主义思想表达对人类不幸事件的同情，讽刺宗教的虚伪性，但又充满悲观、绝望、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

在《胜利者的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 1973)这本书里，作者假托一个名叫菲尔博伊德·斯塔奇的人做为故事的叙述者。他告诉读者他所叙述的是关于“两个孤独而精瘦的、有相当年纪的白种人在一个迅速死亡着的星球上相遇的故事”。一个是在冯尼格过去的小说中几次出现过，但在书中的地位没有现在重要的科学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另一个是汽车业资本家德万·胡佛。特劳特写了一本无聊的书，书中描写“宇宙创造者”创造了许多生物，其中有一个新品种是宇宙创造者的试验品，只有他有自由意志，能够自己做主。其他的生物都只是完全按上苍预定的计划行动的机器。德万·胡佛读了特劳特这本书后，就以为自己是那个造物主的试验品，周围的人都只是为了刺激他，来完成这个试验的机器，因此，他认为他们不知道痛苦。于是他就在疯狂状态中把一个酒宴上的许多人都打成了重伤。这本小说讽刺的范围比较广泛，除去作者一贯的反对战争，反对把人变成机器，反对资本家的剥削行为之外，还对种族歧视问题、文艺商品化问题、美国社会秩序混乱问题等等做了深刻的讽刺，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所讽刺的这个国家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它是“这个

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它“威胁别的国家”，它“反对共产主义”等等。在尖锐地、无情地讽刺的同时，作者的态度仍然是悲观、绝望的。他把地球看做是“一个被损坏的星球”，“一个迅速死亡的星球”。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猫的摇篮》(Cats Cradle, 1963)这本小说。

《猫的摇篮》是美国读者，特别是大学生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它尖锐地讽刺了美国以及西方社会中许多现象，如宗教的欺骗性，政治和宗教勾结起来欺骗人民、现代战争的残酷性等。

这部小说和作者在十年后发表的另一部小说《胜利者的早餐》一样，也是假托另一个小说家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以便于真的作者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更自由地讽刺和批判，在语言方面也可以毫无拘束地使用通俗口语甚至俗语俚语来加重讽刺、挖苦的分量。

“猫的摇篮”是用一圈绳子绕在双手手指上，翻出叫做“猫的摇篮”这么一种花样来哄小孩玩的、颇似我国俗称“翻牛槽”、“翻绞绞”的那种游戏。作者用它来象征一切骗人的、虚伪的东西。本书内容描写作家乔纳为写书搜集材料，结识了一位参加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原子弹之父”费利克斯·霍尼克的三个孩子。霍尼克博士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曾为美国军队发明了一种能使沼泽冻结的、融点达华氏一百一十四度的“九号冰”，但是这种东西未来得及付诸实用，霍尼克博士就死了，他的三个孩子没有把这一新发明公诸于世，而是私分了，各自用来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女儿安吉拉用它换了

个在兵工厂工作的丈夫，大儿子用它在加勒比海一个叫做“山洛伦佐”的岛国上换取了少将部长这个职务，小儿子牛顿用它换取了与苏联女间谍的一周同居。

小说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山洛伦佐”这个岛国，活活刻画出个受外资操纵的殖民地的真相。统治着这个殖民地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是两个亡命之徒，两人勾结起来，一个是“暴君”麦克凯布，他宣布那位宗教领袖“博克依”以及他所发明的宗教“博克依教”（也是“博克依主义”）是非法的，并下令通缉博克依；另一个，即博克依本人，则以“圣人”的面目出现，用宗教的谎言麻醉人民。人民保护着他。他假意躲在森林中，信徒们给他送饭。实际上无论是与他同来岛上的、扮演暴君角色的麦克凯布或是麦克凯布的继任总统蒙扎诺“爸爸”都并不想真地捉住博克依。所以博克依尽可以永远做一个逍遥法外的“逃犯”。这样，这种政、教勾结的势力长期统治着愚昧、可怜的岛国人民。

若干年后，蒙扎诺重病不堪痛苦，吞服“九号冰”自杀，适值小说家乔纳访问该岛，蒙扎诺指定的继承人将总统职位自愿让给乔纳，但事竟未成，因为意外一阵龙卷风造成大灾。大风吹倒了放有死于“九号冰”的两具尸体的宫殿。“九号冰”污染了大海和陆地，使许多生物和人都死了。乔纳和少数人幸存下来。

《猫的摇篮》一书中讽刺的对象，用书中一个人物朱利安·卡斯尔的话说是“整个时代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事上政府对外多次发动侵略战争；政治上出现了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工业发达，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了机器取代了

工人，从而使“人”的作用“贬值”，失业人口增加；环境污染成为严重的威胁；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社会危机导致人的思想危机。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成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思想中一个经常考虑的问题。《猫的摇篮》一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

霸权主义的暴力和军火商的疯狂，落后国家的贫困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群众的愚昧；政治和宗教勾结在一起压迫、麻醉和欺骗人民，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人的生存，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前进。这便是冯尼格的《猫的摇篮》一书中的主要思想。

小说中首先表现出作者的反战思想；揭露霸权主义者一方面叫嚷着热爱和平，另一方面却竭力搞核武器竞赛。在军火制造的研究实验室中挂出了“世界和平”和“与人类为善”的庆祝圣诞节的标语。“原子弹之父”费利克斯·霍尼克一生都在发明着毁灭人类的武器，在他的墓地里竟会出现象征“繁殖”的墓碑。他们这些军事科学家可能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只懂得把制造军火当做游戏的人。作者用一个疯人，电梯司机的口来说这些科学家都是“疯子”。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霍尼克本是“连一只苍蝇都不愿伤害”的人。他只是游戏人生。天气冷使他想到把脖子缩进甲壳内的乌龟，于是就玩起乌龟来；只是人家把他的乌龟拿走以后他才又“玩”起军火的发明来。作者提出“怎么能说一个能够帮助制造出象原子弹这种东西来的人会是天真无邪的呢？”这样一个问题来。他的回答是：这些人“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死人？”他们“既能逃避人类的责任，又能享受到荣誉和创造者的快乐。”作者意味深长地让那个军事科学研究实验室建立在二百年前杀人的刑场的故址上。

在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军事科学和军事科学家的罪恶的同时，作者又强调了科学能造福人类的这一方面，特别指出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科学之苦。书中那个由外资控制的“山洛伦佐”岛国中人民愚昧、无知，在几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民不聊生。这个国家的总统在临死前指定下一届总统任命人选的理由是后者（弗兰克林·霍尼克）“有科学”，他嘱咐弗兰克林教给人民“科学”，他说：“科学是能起作用的魔术。”作者又怀着极大的怜悯、同情的心情讽刺说：“那儿的人民贫穷、担惊受怕和无知到了毫无常识的地步，”因而对于“进步”的事物中感到兴趣的东西只有“电吉他琴”。象弗兰克林那样心灵手巧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出路，在殖民地社会中又无用武之地。

最后作者哀叹，人类要攀登科学高峰，要知道宇宙的秘密，然而又不能把知识用于造福人类的目的，其结果将导致自我毁灭。他写道：人类“昼夜工作了五十万年，为的是能爬上那座高山。”然而攀登的目的何在？“我的手中该拿着什么呢？”无疑，该拿着“造福人类”的旗帜。

不幸的是，在作家所处的社会中他看不到哪个人手持那面崇高的旗帜，因而他用老卡斯尔的口忿然痛斥：“人是邪恶的，人类做不出什么值得做的东西，也不懂什么值得懂的东西。”

霸权和暴力摧毁着人类。书中描写当龙卷风把“九号冰”吹遍大地，生物毁灭殆尽的时刻，一小撮蚂蚁却由于吃自己的同类的肉而活了下来。它们“吃吃，喝喝，快快乐乐，到了明天，就不再活。”人类也有主张向这些蚂蚁学习的。学习它们，“只要把地球上的人数锐减一半，就能大大有助于缓和你

自己的社会问题”，生动地勾画出霸权主义者的嘴脸。

可惜作者只限于从人道主义出发，歌颂人的“神圣”，赞美“小小的人类”能够移动大山，说只有人是上帝用泥制的一切生物中唯一能够“坐起来”的一种生物；只看到和反对用暴力或麻醉剂压迫或是欺骗人民的一面，没有认识或赞成人民也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反动统治的另一面。

作者通过对“山洛伦佐”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等的描述，把一个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殖民地人民的贫穷、落后与上层分子的独断专横以及一切虚伪的装饰揭露得淋漓尽致。

书中再一次表现了冯尼格一贯的反对用宗教麻醉人民的思想。这部小说在反对宗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揭露宗教与政治勾结在一起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一方面。

小说中描写宗教都是骗人的谎话，但是，“当行政和经济的改革都没有能使人民少受一点罪的时候，宗教就成了使人寄托希望的东西了。”

书中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谓“自由”和“民主”的虚伪性。这个殖民地国家把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混为一谈，不问青红皂白，一概都称之为“自由的敌人”。他们在一个节日里把他们所谓的“自由的敌人”一个个画出来当靶子，叫飞机扫射这些“敌人”。作者十分刻薄地让这些飞机在没有开始射击之前就自己烧着了或是被大风吹落了。书中对五十年代美国政府恐共、反共到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的程度也嘲笑到家了。一位驻外大使只因他夫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说了一句话就被指控为同情共产党而撤职。

所谓“民主”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代号。“山洛伦佐”这个岛国每年要举行纪念“民主百人烈士”的大会。还有

一条街以“民主百人烈士”命名。这是些什么人呢？原来是一百个应征入伍的山洛伦佐共和国的青年，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后被装在一艘军舰里受训，这条军舰正开往美国去“为民主而战斗”。不幸这条船刚一起锚就被德国潜水艇炸沉了。这一百个生前决无一点民主权力的雇佣兵青年便在死后被尊称为“民主百人烈士”。

冯尼格的这部小说和作者所写的许多其他小说一样，以章节简短为艺术形式上突出特点之一。复杂的情节、多层的线索都十分恰当地安排在简短的章节和因而构成的不大的全书篇幅之中。只有用夸张到荒谬程度的手法才能把纷乱的社会现象和隐蔽的心理活动以及作者的批评意见浓缩为警策性的句子，才能做到语简言奇、含义深切而精辟动人。

这部小说的风格幽默辛辣，语言简洁有力。作者以《博克依的书》中那些“小调”道出许多深刻思想。

最后谈一谈作者对他所揭露的问题的态度。冯尼格被美国有些评论家列入“黑色幽默”作家的行列中。“黑色幽默”是六十年代在美国盛行一时的文学流派，始为美国犹太作家所创，继而在非犹太作家中也广泛流行。它的特点为对阴暗事物揭露时，使用嘲讽、幽默的手法。这与犹太文学中的“犹太幽默”一脉相承，犹太人在全世界遭遇到不平的待遇，却又相信犹太教旨的为赎罪而受难，故对残酷与不幸采取苦笑一声的态度。当然，在六十年代，美国犹太作家的“黑色幽默”早已没有宗教意味，却又不免受了西欧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把人生和世界视为荒诞无稽的，认为人对世界是无从认识也无能为

力的，因而只能采取嘲笑、讽刺的态度。库尔特·冯尼格本人不承认他属于“黑色幽默”作家，他责怪评论家给他贴标签。我们不想一定给他贴上是“黑色幽默”作家或不是“黑色幽默”作家的任何标签，而着重要看一看他对他书中所讽刺的对象的态度。可以说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鞭笞是毫不留情的。他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叫苦连天，为殖民地的人民鸣冤喊屈，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确乎是寄予同情的。

然而他又是悲观的宿命论者。他的世界观限制了他。他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度发展的工业带来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因而对整个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这部小说中作者在《博克依的书》里发出那样痛苦、绝望的呼声：“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对已经在地球上有一百万年经验的人类抱什么希望呢？”回答是：“不抱什么希望。”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史家伊哈布·哈桑在《当代美国文学》一书中评论库尔特·冯尼格时说他“部分是讽刺作家，部分是幻想家，从六十年代后期突然时髦起来，特别在那些不满意军国主义、贪得无厌、过分的理性、各种因生态学和工艺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灾难的青年们之间受到欢迎。”同时又说冯尼格是“宿命论者和梦想家”，“把他的苦恼隐藏在奇异的轻率之中”。而他的贡献则在于“对他的时代有一种忠实的理解”。伊哈布·哈桑的这些看法我们是同意的。

读者将从这本书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作者所批判的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法中，设想有些方法只要用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优点才可以发挥，其弊端才可以避免。读者也可以从这种以讽刺、幽默的手

法、含泪嘲弄的态度使人笑着摒弃一切不合理的事物的独特风格中观察其有力之处与薄弱方面，参考它们以丰富我们的写作技巧。此外，从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青年，喜爱这本书的事实中进一步对美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爱憎有所了解。

——译者

第一章 世界的末日

叫我“乔纳”吧！我父母就那么叫我，或者说他们差不多那么叫我。他们管我叫“约翰”^①。

乔纳也罢，约翰也罢，那怕我本来的名字叫山姆呢，我也还得是个乔纳。倒不是因为我有命无运，而是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或是一些事把我在某个时间带到某个地点，没个错儿。我的思想动机和表达方式既有平平常常的一面，也有稀奇古怪的一面。还有，按照计划，在每一个指定的时刻，在每一个指定的地点，这个乔纳就在那里。

听着：

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那就是说，在和两个妻子离婚之前，在抽过二十五万支香烟以前，在大醉于三千夸脱烈酒之前……

当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开始搜集材料，要写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世界的末日》。

这本书要写真人真事。

这本书要报导第一颗原子弹落在日本广岛的那一天，美国的一些头面人物都在干什么。

这本书要写成一本宣扬基督教义的书。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呢！

^①“乔纳”和“约翰”，在英语中两个字音相近。——译者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博克依教徒了。

要是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教给我博克依教的那些苦甜交汇的谎话，那我当时就能成为博克依教徒了。可是当时，在山洛伦佐共和国之外，也就是在这个为砾石海滩和嶙峋珊瑚环绕的加勒比海小岛之外，根本没有人知道博克依教。

我们博克依教徒相信人类都是编组成队的。这些组织都按照上帝的意志活动，可是他们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博克依把每一个这样的队称做一个“卡拉斯”。把我带进我自己所属的那个“卡拉斯”的证件（博克依教称之为“坎坎”）就是我那本没有写完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的末日》。

第二章 好，好，可真好

博克依写道：“要是你发现你的生活和另一个什么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了，可是又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原因，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是你的‘卡拉斯’里的一个成员。”

他在《博克依的书》中还教导我们：“人类创造棋盘；上帝创造‘卡拉斯’。”按照他这句话的意思，一个“卡拉斯”是没有民族、制度、职业、家庭和阶级界限的。

它是象阿米巴^①那样千变万化的。

博克依在他的“第五十三首小调”中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唱：

“呵，一个在中央公园里

^①阿米巴是一种在淡水里生长的微生物，是动物中构造最简单的生命。